

## 清代黄河治理与区域社会的发展

### ——以闸坝减水工程为中心

贾国静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 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清代黄河治理与区域社会发展的关系需要结合时人的认知与实践做进一步探讨。靳辅治河期间,朝野围绕可否引黄灌溉展开大规模讨论,靳辅基于黄水含沙量过大与河道淤垫抬高的形势持反对意见,但其在黄河大堤上建造的闸坝减水工程,将黄淮运湖与沟渠湖泊勾连,从而构造起巨大的以防洪和水运为重、兼及农田灌溉的防洪型水利网络。不过,作为国家河漕大政的产物,其运转深受黄河水沙特性、工程技术水平等诸多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制约,区域社会既受其益,亦不时遭受水患。及至清中期,随着该网络运转问题重重,官民冲突不断,道光十二年陈端盗决案即为重要案例。

**【关键词】**清代; 闸坝减水工程; 区域社会; 陈端盗决案; 防洪型水利网络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3-0097-13

## Control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Focusing on Sluices and Dams Projects

JIA Guojing

(Key Research of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trol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needs further exploration by considering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s. During Jin Fu's tenure in river control, extensive debates were held in the court and out regarding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Yellow River water for irrigation. Jin Fu opposed this idea, citing the big silt content and the high riverbed of the Yellow River. However, sluices and dams projects he constructed interconnected the Yellow River, Huai River, the Grand Canal, and the Hongze Lake, as well as other lakes and rivers, and then made a massive flood-control hydraulic network that prioritized flood-controlling and water-transport, while also considering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Nonetheless, its ope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constra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ellow River,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echniques, and various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While the regional society benefited, it also frequently faced floods. By the mid-Qing Dynasty, the network encountered numerous issu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officials and civilians persisted, which the case of Chen Duan destroying the yellow river dyke in the twelfth year of Daoguang's reign was a significant example.

**Key words:** Qing Dynasty; sluices and dams projects; regional society; Chen Duan destruction case; Flood-Control hydraulic network

[收稿日期] 2023-10-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生态史观视野下的清代黄河治理研究”(20BZS107)

[作者简介] 贾国静(1977-),女,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清代黄河史、中国近代灾荒史。

黄河治理这一清代“国之大政”<sup>①</sup>,受到学界较多关注,但几乎未涉及相关工程兼顾区域社会发展的一面<sup>②</sup>。基于底层视角的研究甚至直言,面积广阔的“淮北”因国家防洪工程而“缺失”农田水利。关于黄河水利史的专门研究,则认为自两岸堤防修成,“不再引黄河水灌溉”,明清两代尤其如此<sup>③</sup>。进言之,学界长期以来存有一种成见,就像民国时期所言,历代“仅知防止水患,而不知兴修水利”<sup>④</sup>。近年,虽有研究关注清中后期苏北平原圩田体系和垛田体系因着泄水增多而获得的发展<sup>⑤</sup>,但是国家防洪工程如何兼顾水利开发,仍需进一步探讨。因为早在康熙朝靳辅治河时即有此考量与实践,沿河区域社会亦有因应与调适。或者说,黄河作为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能动性环境要素,除了过往探讨较多的防洪与水务问题,其资源价值如何被发掘,同样值得关注。这不仅有助于从环境与技术的角度更为全面地认识国家防洪工程,从而拓展国家河漕大政的认知维度,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清代黄河下游水环境变化与区域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本文拟作一尝试,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 一、靳辅治河时闸坝减水工程的建造及其影响

### (一)关于引黄灌溉的讨论

靳辅治河之初,朝野就如何治理河患存有较多争议,包括可否在防洪的同时开发农田水利。当时,有人推崇西汉贾让治河三策中的穿渠引水改良土质说,而靳辅极力反对。在其看来,黄河形势今非昔比,多开引渠淤灌农田虽属“善策”,但“止可行于运河之清水,不可行于黄河之浊流”,原因在于:

盖清水弱而易引,浊流强而难御也。惟有坚筑径二三尺小石涵洞,以通其流。而近则又畏河之冲,必须于数里之外为之。然河善淤,自古记之,通河引灌,虽极卑洼之地,一过而平,再过高,不出数年,且深谷为陵,若岁岁开挑,出自国,则为费不赀,出自民,则民力势有所不能。故即不惜帑金,多为涵洞,其利无过五六年,得仅偿费耳。安得曰兴利除害!……故自有此河,即有此堤防之制。<sup>⑥</sup>

可见,靳辅赞同清水灌溉而反对浑水灌溉,理由主要是黄水泥沙含量太大,水溜太强,再加上河道淤垫抬高,已成地上悬河,引渠的成本太高,风险难以控制。亮明这一观点后,所言“今臣独创论而辟之,世必竞起而驳臣之谬,且嗤臣之妄”,又从侧面说明当时朝野就可否引黄灌溉存有较大范围的争论。无论如何,靳辅的观点并非孤论。陈潢作为其得力幕僚,亦持类似论说。

由于黄河治理关涉甚重,广受社会关注,不少时贤就此发表看法。精通水利的薛凤祚在其著述中有言:

如贾让所云,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可乎?愚曰,此法行于上源河清之处或可,兰州以下,水少沙多,一灌田中,禾为沙压,尚可食乎?……盖河水经行之处,未有不病民者。<sup>⑦</sup>

① 傅泽洪辑:《行水金鉴》卷172《河南管河道治河档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515页。

② 参见贾国静:《二十世纪以来清代黄河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③ 参见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3—225页。

姚汉源:《二千七百年来黄河下游真相的概略分析》,《黄河水利史论丛》,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④ 崔景三:《黄河富源之利用》,胶济铁路管理局,1935年,第10页。

⑤ 王建革、袁慧:《清代中后期黄、淮、运、湖的水环境与苏北水利体系》,《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⑥ 靳辅:《治河方略》卷2《论贾让治河奏》;王云、李泉主编:《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⑦ 薛凤祚:《两河清汇》卷7《开支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扬州文人朱鉉的相关记述与之类似,只是将薛凤祚之问记为明代潘季驯所言,并加按语如下:

河流浑浊,非极迅溜,即至停滞,枝(支)河一开,正河必塞,且浊流溉田,亦不利,徒增一纷扰耳!所以桓谭新论,禁民引河溉田,非无见也。<sup>①</sup>

可见,薛朱二人认为引黄灌溉不可推行的原因跟靳辅和陈潢的考量一样,即黄水泥沙含量太大,河道形势不允许。文人夏驷则进一步分析,贾让治河三策中所讲的引黄灌溉,“止言冀州石隄三百里间耳”,并非就全河而论;黄水含沙量今非昔比,可以“引黄以淤洼”,助力河防,但不可引黄灌溉,发展农田水利;治河之策惟有建筑两岸大堤,辅之以闸坝涵洞,“舍此之外,别无奇谋异见矣”<sup>②</sup>。

结合该时期黄河的水沙状况以及清廷的治河实践,众人所论不无道理。不过,靳辅秉持的黄淮运湖综合治理的理念与相关治河实践使得黄水灌溉以一种间接的特殊形式出现,由此形成的水利网络更将治河工程与区域社会发展密切关联在一起。

## (二)靳辅关于徐州闸坝减水工程的构想及其实践

靳辅认为“黄河之治否,系数省之安危”,即便无关运道之处,也应加以修治<sup>③</sup>,实践中则采取了黄淮运湖诸水并治的办法。其中因应徐州附近上宽下窄、极易发生溃决的河道形势,在防洪大堤上建造闸坝减水工程,为一关键环节。起初,他计划在黄河北岸建设涵洞15座,开挑引河15道,以沟通沭河,达到如下目的:

此工一成,涝则大小相承,河洞互引,民田无淹漫之忧,旱则沟洫可蓄,车庠得施,不过数年,此周围千里沮洳之地,当一变而尽为水田秔稻之乡,其饶且与江浙之苏松、嘉湖等郡埒矣。<sup>④</sup>

可见,该工程虽然重在防洪,但亦顾及农田水利这一关涉沿河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甚至希望实现“其饶且与江浙之苏松、嘉湖等郡埒矣”的美好愿景。在关于如何缓解财政困境的奏疏中,靳辅还讲到“河害之不特可除,而并可因之以以为大利也”,其意主要指临近黄河的凤、徐、淮、扬四府,可以雇募百姓,利用沟田法发展农业生产<sup>⑤</sup>。

对于两岸闸坝涵洞的实际建置情况,靳辅晚年做过较为详实的总结。其中南岸建有:砀山县毛城铺减水坝一座,减水闸一座;徐州王家山天然减水坝一座,十八里天然减水闸二座;睢宁县峰山、龙虎山天然减水闸四座;宿迁县归仁堤便民闸一座,五堡闸一座。这些闸坝所减之水均沿途沉淀,最终“入洪泽湖助淮”。与之相较,北岸所建二十余处闸坝与涵洞所减之水,去路不一,或汇入北运河,或汇入中河由平旺湖入海,或“从高宝诸湖出高宝各减坝入下河”。在靳辅看来,防洪大堤、减水闸坝与涵洞三者建设齐备,“或平畴绣错河润是需,或下土沮洳停淤成沃,功亦大矣哉”<sup>⑥</sup>。进言之,此举将黄运河湖连为一体,从而构造起一个巨大的清黄水网络,其中减水闸坝可助力黄河下游防洪,所减之水沿途澄清后则既可助力洪泽湖蓄清刷黄,维护运河水源,亦对区域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谓一举数得。乾隆年间绘制的《南河黄运湖河蓄泄机宜图说》图文并茂,内容详实,非常清晰地展现了“江南黄运湖河形势相错,脉络贯通”的形势,并称赞靳辅兴举的闸坝减水工程“纾患而兼收其利,法诚善也”<sup>⑦</sup>,只是后来黄河形势变迁,此类工程的功能不断受到影响。光绪《淮安府志》“河防”一门述及靳辅的闸坝减水工程时,称赞“其论至精,人以为季驯有不逮焉”<sup>⑧</sup>。

① 朱鉉撰:《河漕备考》之《历代治河考》,清抄本。

② 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卷96《工政》,光绪十二年武进盛氏思补楼重校本。

③ 靳辅:《治河方略》卷6《河道弊坏已极疏》;王云、李泉主编:《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4册,第118页。

④ 靳辅:《治河方略》卷2《治纪中·北岸水利》,王云、李泉主编:《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4册,第53页。

⑤ 《靳文襄公奏疏》卷7《生财裕饷第一疏·开水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43册,第869页。

⑥ 靳辅:《治河方略》卷3《治纪下·闸坝涵洞工》,王云、李泉主编:《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4册,第70-71页。

⑦ 《南河黄运湖河蓄泄机宜图说》,世界数字图书馆, <https://www.loc.gov/item/2021666368/>。

⑧ 光绪《淮安府志》卷5《河防》,光绪十年刻本,第11页。



关于该工程与区域社会发展的关系,乾隆八年(1743)两江总督德沛颇有感触地讲到:

两江七府州为黄、淮、湖、运交会之区,河渠沟洫联络贯通,事属一体。故蠲除水患,必须于河道、水利通筹全局,相机修治……淮、扬、徐、海、凤、颍、泗七府州地既卑下,又为百川汇聚归江归海路径,黄、淮二渎为之经,南北运河为之纬,南以洪泽湖为潴,而高、宝、邵诸湖承其下流,入运分趋,以归于江海;北以微山湖为潴,入运分趋,而骆马湖承其下流,以归于海。中间大川支河小港旁沟湖荡陂泽,各就所近,分入黄淮湖运,此其大较也。<sup>①</sup>

德沛作为两江总督负有协办河务之责,故而对治河工程与区域社会的发展多有关切,感受颇深。在其看来,既然黄淮运湖与大小河渠湖泊“联络贯通,事属一体”,那么必须将区域社会的水患问题与河道治理、兴修水利统筹考虑,“相机修治”。进言之,靳辅于黄河两岸建造的闸坝减水工程虽然重在防洪,但由此形成的清黄水网络覆盖面非常广阔,国家防洪工程与区域社会发展亦更为密切地关联在一起。至于具体情况,将以淮扬地区为例进行厘析。

### (三)淮扬地区农田水利的因应与发展

淮扬地区河湖沟渠密布,水资源堪称丰富,但因黄淮运交汇于此而深受国家治河工程的影响,运河东面的山阳、高邮、宝应、盐城、兴化、江都和泰州等下河七州县,由于地势低洼,更遭遇了严重的水患。康熙帝为此专门派人兴举工程进行疏浚,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雍正五年(1727)修建的康熙圣德神功碑文中述及,“下河七州县,化浸为沃,农桑遍野,漕艘商舶,上下数千里,安若衽席”<sup>②</sup>。进言之,因应闸坝减水工程给下河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康熙帝再举下河工程,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区域社会的发展状貌。

对于下河地区的农田灌溉,靳辅主张通过建设涵洞来实现。在其看来,涵洞有三利,即“减水”,“淤洼”和“溉田”,其中“溉田”主要指“耕种之区资减水而得以灌溉,洼下之地借减黄而得以淤高,久之而硗瘠沮洳且悉变而为沃壤”<sup>③</sup>。治河实践中,有河官建言淮扬运河两岸可“仍听民间多建涵洞小闸,以为灌溉之资”,“靳公即欣然疏请”<sup>④</sup>。此后,颇受器重的河官张伯行曾就洪泽湖附近的灌溉问题力言,“穿渠引水,灌溉民田,‘则高堰之堤可保,凤泗之水可消,而民间更获灌溉之利’”<sup>⑤</sup>。延及乾隆七年,漕运总督顾琮以亲眼所见建言,“蓄泻得宜,地无南北”,淮北地区应仿照淮南在运河河堤之上“创设涵洞,导流引灌”的做法,大力发展农业生产<sup>⑥</sup>。进言之,在朝廷精心构造的清黄水网络中,民间利用清水灌溉的情况多有存在,官方亦支持区域社会在河漕大政之下利用清水谋求发展。这在方志文献中有更为细致的记述。

据乾隆《淮安府志》记载,在康熙朝大举治河以前,若遇大旱,诸河湖的堤闸不可开启灌溉农田,这一方面是为了顾全河防与漕运的大局,而同时还因为旱情严重之时,淮河清水变弱,洪泽湖无法“蓄清刷黄”,易于造成黄水顺势倒灌,淤平过往开挑的支河沟港,并加剧“地赤禾焦,蝗蝻蔽野”的旱情。及至康熙大兴治河工程,讲求水利,这一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致而言,治河工程兼顾水利开发的理路为:

是治淮黄止欲去其害,而各县之支河沟港,则欲兼资其利。淮黄之治,止在蓄清刷黄,有利于运,而水利之堤防宣泄,则须随地制形,早潦有备,无害于民。要使淮黄运之水泄入于支河,自支河以泄入于沟港,如脉络之相灌输,有余则悉令归入海。故水利者,分其下海之流,而因以为利,泄其奔腾之怒,而亦因以去其害。水利与治河诚相表里者也。<sup>⑦</sup>

① 乾隆八年正月初二日两江总督德沛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98-002。

② 《清世宗实录》卷55,雍正五年闰三月丁丑。

③ 靳辅:《治河方略》卷2《治纪中·闸坝涵洞》,王云、李泉主编:《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4册,第59页。

④ 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153《周洽竹冈日记》。

⑤ 张伯行:《居济一得》卷7《高堰内水利》,清正谊堂全书本。

⑥ 顾琮:《请广淮水水利疏》,《清经世文编》卷111《工政》,光绪十二年思补楼重校本。

⑦ 乾隆《淮安府志》卷1《图》,咸丰二年重刊本,第3页。

可见,黄淮运湖通过所泄之水与支河、沟港连通,形成了诸水“脉络贯通”的形势,如此,防洪与灌溉一体存在,可达到“治淮黄止欲去其害,而各县之支河沟港,则欲兼资其利”的目的。或者说,“水利与治河诚相表里”,成为关系淮安府社会稳定与农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

或许由于自康熙大举治河起,淮安的农田水利更具特殊性与复杂性,乾隆初年重修方志时专门辟出“水利”一门。该部分开篇即言:

浙西之地,至为卑湿,而吴越及宋南渡……一二百年间,水灾仅一二见,农桑遂为天下最,法至善也。淮郡多旱田、圩田,悉苦于水,若多浚广阔之渠,以泄停潦,筑高厚之圩,以捍横汗,而于可引活水溉泻卤为稻田者,凿渠以通之,传置官司,不吝重费,安见淮南滨水之乡不变为浙西哉。<sup>①</sup>

可见,就像靳辅于黄河两岸兴举闸坝减水工程时的美好愿景那般,淮安将“浙西”地区作为愿景,着力发展农田水利。接下来悉数各河渠的水利开发情况时,亦述及治河工程与地方水利的关系之密切。以涧河为例,该河本为沿河百姓的灌溉之资,“兼泄城中积潦”,而自靳辅治河“黄流分入”,河道被淤,进而引致其灌溉与泄水功能紊乱。直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地方政府奉朝廷之命筹资挑浚,涧河才得以重新发挥其灌溉农田的作用,乾隆十三年(1748)重修方志时,所能灌溉的农田已达“数千顷”<sup>②</sup>。

淮安东南部的泰州,康熙朝大举治河以前,水患极为深重,而此后,由于黄淮运水系运转步入正轨,康熙帝又注重发展下河水利,“昔日污莱,今成沃壤”<sup>③</sup>。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河副总河嵇璜制定沟渠挑浚办法,发动地方官仿照康熙朝的做法每年疏浚沟渠,是为该地农田水利发展的又一重要时间节点<sup>④</sup>。另从嵇璜的相关奏折来看,淮扬运河东堤闸坝减水较多,其中高宝段“原设石闸十余座,水大则藉以泄水归海,水小则藉以灌溉民田,甚为有益”,不过下河各州县的众多沟渠不乏淤浅或者阻塞的情况,故而疏浚工程应根据情况,“有隶属水利,应于江苏藩库内动支者,有隶属盐务,应于两淮运库内动支者,有隶属河工,应于河库内动支者”<sup>⑤</sup>。

魏源的一番分析又从另一侧面揭出了治河工程与该区域发展的利害关系:

殊不知西水之于下河,能为害亦能为利,如使终年西水不入下河,亦非民田之福也。不但东台、盐城、阜宁海卤地咸,全恃西水泡淡,始便种植,即高邮、泰州、兴化、宝应、甘泉等县,亦赖西水肥田,始得膏沃而省粪本。凡西水所过之地,次年必亩收加倍,如年年全不开坝,则下河田日瘠,收日歉。<sup>⑥</sup>

其基于黄河的水沙特性认为闸坝所减之水能够肥沃下河地区的土壤,具有利的一面,不无道理。进言之,清前期的淮扬地区,尽管没有如靳辅所预想的如江南那般丰饶,但无论如何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总之,靳辅兴举的闸坝减水工程作为黄淮运湖综合治理方略的重要一环,将黄、淮、运、湖以及大小沟渠河湖连在了一起,从而构造起一个巨大的清黄水网络。这有助于消解水患,保障漕运畅通,而同时亦有利于区域社会的发展。不过,受黄河的水沙特性影响,减水在汇入洪泽湖的过程中必然造成泥沙沉积淤垫河道的问题,该工程所联动的河工大政与区域社会发展的关系不断变化。

① 乾隆《淮安府志》卷8《水利》,第1页。

② 乾隆《淮安府志》卷8《水利》,第8页。

③ 雍正《泰州志》卷1《职方志》,第10页。

④ 道光《泰州志》卷4《河渠志》,第20页。

⑤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南河副总河嵇璜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5-0013-003。

⑥ 魏源:《再上陆制府论下河水利书》,《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387页。

## 二、乾隆以降清黄水网络中的河工与社会

### (一)关于修复毛城铺闸坝减水工程的争论与实践

乾隆元年四月,河南永城县与毗邻的江苏萧县因黄水异涨时毛城铺闸坝减水过多而遭遇水患。河南巡抚富德在奏陈中还述及,四十年前毛城铺减河就日渐淤垫,以致所泄之水冲开祝家水口这一新河道,而对此情形,地方官碍于减水河道“关系全河”,“不敢轻议堵塞”,附近百姓虽为保护田庐自发地挑挖了一道减水沟,但效果有限<sup>①</sup>。由于黄河水患关系荒政与河政这两大国家要务,乾隆帝命南河总督高斌与两地巡抚商讨河道疏浚办法,并派熟谙河务的大学士嵇曾筠与两江总督赵弘恩亲自前往勘察。

该年九月,高斌等人奏称,靳辅当年建设的南岸减水闸坝虽为“分黄导淮,以水治水之善策”,但是时间一久,水道淤浅,下壅上溃,“伏秋水发散漫无归,致为民患”,因此,请求将毛城铺闸坝以下的六百余里水路,“节节疏通,处处利导”,以使减泄之水“有容纳之区,复有分趋之路”,“利河便民”,“永除水患”<sup>②</sup>。可是,这招来了颇具声势的反对,尤其是淮扬籍京官十余人联名奏陈其危害。对此乾隆帝命高斌、赵弘恩以及江苏巡抚邵基“悉心筹划”,“务于运道、民生完全无弊”,挑浚工程“暂行停止”<sup>③</sup>。同时将淮扬籍各官所言的“毛城铺必不可开”,交给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以及直隶总督李卫商讨<sup>④</sup>。而三人认为高斌应进一步与督抚商讨疏浚工程是否可行。

此时,高斌与诸督抚的筹商根本达不成一致意见。在其看来,江苏巡抚邵基对河道减水蓄泄之事“不能明晓”,李卫所言“更属茫然”无知,并不由得地感叹。

不难想见高斌的心情与处境。至于其进京后与诸臣抗辩的情形,方志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大致为:争论双方言辞激烈,淮扬籍京官11人“连衔会奏,力陈其非”,就连主持人“以奉旨疏浚下流为言”,亦一度被驳得语无伦次,结果减河虽得疏浚,但相较原计划,有变更<sup>⑤</sup>。后续高斌在奏折中讲到,工程得以继续,全赖“皇上圣明乾断”<sup>⑥</sup>。事实当的确如此。

随着疏浚工程的推进,加强管理被提上日程,高斌就此呈奏的办法多被采纳,并记入了《清会典事例》:

(乾隆三年)遵旨议定,毛城铺减水坝迤下河道,令丰萧碭河务通判、铜沛河务同知、邳睢灵壁河务同知、宿虹河务同知、山盱河务通判,各照所属地方分界管理。<sup>⑦</sup>

可见,经过此番水患与各方辩论,减水闸坝工程更受重视,日常修守亦被纳入了河工体制。由此,靳辅精心构造的清黄水网络得到了维护与巩固。

不过,乾隆二十一年(1756)大学士陈世倌的一番奏陈又揭示了该工程的社会效应变化之快。据其奏称,铜山、邳州、碭山等二十余州县连续几年遭受水患的原因在于,黄河南北两岸建设的闸坝减水工程,“分泄河流,以致水缓沙停,河底日高,河身日饱,不能容纳”,所过之处则“无不淤垫”,当年起缓冲作用的小神湖“早已淤平”,泄水的最终归宿洪泽湖亦因湖底淤垫,“奔溃四出”,并由此抨击靳辅兴举的这项工程是为了“分水而保堤”,后任河督将其“奉为成宪,而不敢违”,实在是荒谬,在其看来,“黄河分泄之水,宜设法归海,方免民田之患也”<sup>⑧</sup>。无论这一改进方法有无实践的可能,陈世倌所讲的沿河区域社会

① 乾隆元年五月初四日河南巡抚富德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09-003。

② 乾隆元年九月初八日南河总督高斌题,题本,档号:02-01-008-000027-0013。

③ 乾隆二年正月初十日南河总督高斌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21-007。

④ 乾隆二年三月十一日两江总督庆复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19-014。

⑤ (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7《艺文志下》,第83-84页。

⑥ 乾隆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南河总督高斌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21-002。

⑦ 光绪《清会典事例》卷901《工部·河工·河员职掌1》,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0册,1991年,第410页。

⑧ 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学士陈世倌折,录副奏折,档号:03-9751-057。



遭受的水患更为频繁且深重,都表明靳辅兴举的闸坝减水工程与其最初的构想越发疏离。

乾嘉之际,黄河下游频繁决溢,清廷不断寻求缓解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徐州河道于嘉庆四年(1799)毛城铺漫口之后备受关注。该年六月初,毛城铺减坝照例启放,可由于上游来水较旺,大雨又数日不绝,泄水掣动了大溜,所刷沟槽五道,“各宽二十余丈至七八十丈不等”<sup>①</sup>。南河总督吴璥经实地查勘认为,其原因“固由于节次漫口”,河道淤垫,而闸坝减水工程亦造成“其患渐成”;尤其是近年险工迭出,徐州河道“窄若咽喉,又因旁泻过多,遂成中埂”<sup>②</sup>。两广总督吉庆奉命于北上途中顺道查勘,其奏称“徐州城外河身较窄,北边近岸积有淤沙”<sup>③</sup>。两江总督费淳与吴璥认为的确存在这一问题,并认为近年徐州一带黄河形势“倍形险要”的原因在于,“河滩普面淤高,南北两岸数百里堤工,日益卑薄,实难抵御”,“昔年内陆地高于河滩,今则河滩高于内地”<sup>④</sup>。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徐州附近的河道淤垫严重,而闸坝减水工程运转不力竟是重要原因。针对这一状况,嘉庆八年停开毛城铺减坝,而这又造成闸坝减水工程逐渐淤废。

及至嘉庆二十年(1815)三月,两江总督百龄与南河总督黎世序办完睢州大工后,指出近年南河河患较重,“实由于专事堤防而不修闸坝”,其实“河防旧制,闸坝与堤防并重”,“不可偏废”,于是请求在徐州以上依山势建造减水滚坝,这样只需经费四十万两,工程又可以稳固<sup>⑤</sup>。四个月工程完竣,汛期启放新建滚坝,“减黄入湖,各工保护平稳”。闻此,嘉庆帝激动不已,不仅于宫内御园特建河神庙,“升香展礼”,而且亲自撰写徐州新建坝工碑文,附在谕旨之后<sup>⑥</sup>。然而,徐州河道淤垫且影响上下游行水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道光年间“河患实在中满”,“淤积过厚”的问题非常严重<sup>⑦</sup>。

闸坝减水工程的影响不止徐州河道淤垫,朝廷难以治理,道光九年(1829)十月两江总督蒋攸钰、江苏巡抚陶澍与南河总督张井三人合奏中所讲,揭出了该问题在社会层面的延伸:

查徐州府所属地土平行,从前均有支河宣泄……水脉本皆贯通。嗣因历久失修,河身逐渐淤隘,又以从前闸坝冲决,下游受淤,每于夏秋大雨时行水即漫淹,田多浸没。以故民计日艰,弱者流亡,强者劫掠,其命盗重案亦均由此而起……扼要持源,实以兴修水利、复民业而安民生为图治第一急务……必应将各属河道择要接续挑办,方可渐苏民困。<sup>⑧</sup>

可见,闸坝减水工程由于年久失修而造成水网络紊乱,百姓生存与基层社会秩序深受影响,地方官开展的疏浚工程成效有限。由此,三人认为应使用徐州府库所存银两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稳定民生。这大概亦为同治八年(1869)在华西人勘查苏北黄河故道后所讲的,河道附近的天然蓄水库,不仅助力防洪工程,而且对社会发展非常有利,因为这些水库可以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人工灌溉提供水源,且不会损害黄河主干道行水<sup>⑨</sup>。乾隆以降闸坝减水工程对区域社会的影响,在洪泽湖水环境所联动的区域内更为明显。

## (二)洪泽湖水环境恶化及其引致的官民冲突

在黄淮运水系运转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洪泽湖,因水源众多而缺乏韧性。强降雨造成的诸河来水过多,黄河闸坝减泄的水量过大,以及洪泽湖北面刷黄、东面入运的调控状况等,诸多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

① 嘉庆四年八月初四日南河总督康基田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35-0191-024。

② 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署东河总督吴璥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5-0262-005。

③ 嘉庆五年十二月初五日两广总督吉庆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5-0090-018。

④ 黎世序纂修:《续行水金鉴》卷30《南河成案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643页。

⑤ 嘉庆二十年三月初九日两江总督百龄折,录副奏折,档号:03-9777-016。

⑥ 《嘉庆朝上谕档》第21册,第116页。

⑦ 《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南河成案续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3页。

⑧ 道光九年十月初九日两江总督蒋攸钰、江苏巡抚陶澍、南河总督张井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708-054。

⑨ Ney Elias. Subsequent Visit to the Old Bed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40, 1870, pp. 21-32.

均有可能影响其功能的发挥。康熙年间不断加固东面的高堰大堤,修缮附近的闸坝工程,以保障其正常运转。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湖底严重淤垫。乾隆初年“高堰出水石岸有十三四层,工程坚立”,而后数十年间,湖底“渐次淤垫”,石岸出水的高度逐渐变小<sup>①</sup>。由此,洪泽湖的蓄水功能降低,问题不断出现。

嘉庆二十五年(1820)六月,洪泽湖水涨,两江总督孙玉庭与南河总督黎世序奉命开启闸坝泄水,而百姓为抢收庄稼“两次公恳缓期”,官方不得不予考虑。及至七月初八日半夜,多名百姓闯入厅署谴责官府“不肯为民做主”,其中57岁老农陆瑜殒命。闹出人命之后,江都县知县前往处理,最终认定“厅署家丁推跌挟求”致其死亡,并且“于尸格填写推字,自于格内画押”。不过由于此案关系甚重,两江总督孙玉庭高度重视。而其经过一番调查指出,减坝开启的时间早就应百姓之请缓期至初十日开放,而陆汉芸与秦大绶二人“误传”初八日开坝,陆瑜“心怀不服”,遂与众人前往扬河厅属闹事。途中陆瑜“醉饱跌伤垂毙”,死于厅署后,陆、秦等人“起意诬指厅署家人推跌”。进言之,“陆瑜之死是否因推跌致伤”作为本案的关键之处,孙玉庭给出了与江都知县全然不同的解释<sup>②</sup>。无论如何,道光帝都很快发布谕旨,将陆汉芸与秦大绶二人按照凶恶棍徒例,“从重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不得援免”<sup>③</sup>。

不仅如此,为防止清口处发生黄水倒灌,御黄坝经常不能开启,而与此同时,洪泽湖所蓄清水亦不能北出清口刷黄。这样一来,洪泽湖水进多出少,东面大堤的压力大大增加。道光六年七月,据两江总督琦善奏报:

本年御黄坝未启,湖水全注运河……兼系久雨之后,洪湖存水至一丈七尺六寸,三河两坝及拦湖坝全行开放,运河东面堤岸甚形吃重。先经河臣饬放高邮一带归江、归海各坝,广为分减,水势总未消动。至前月三十日,复经河臣饬将昭关坝启放,日内运河之水虽已消去尺许,而洪湖存水仍有一丈七尺四寸。<sup>④</sup>

可见,受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影响,洪泽湖水位极高,河督不得已下令开坝泄水,可效果并不明显。由此还不难想见,洪泽湖泄水致使周围地方遭遇了极为深重的水患。据江苏巡抚陶澍查勘,其情形大致如下:

查勘淮扬水灾,其时运河以西山宝……各境数百里,已汪洋一片,运河以东,下游各州县尤为受水之区……自兴化至盐城一带,东西约二百余里,南北约三百余里,形如巨浸,浩渺无边,几无尺寸之土可以驻足,居民荡析,惟望各坝早闭一日……本年被淹各区比之乾隆五十一年大水,尚深三四尺不等,民间颗粒无收。<sup>⑤</sup>

泰州方志亦有记载,该年六月三十日,泰州段运河昭关坝放水,下河地区全部被淹,百姓被迫四处逃荒,“此百年中未见者也”。<sup>⑥</sup>

如此深重的水患引起了道光帝的极大关注,其命两江总督琦善调查张兆启放昭关坝,是受命前往,还是擅自做主。其实从前文可知,琦善在奏折中已经讲过,鉴于洪泽湖水位太高,河督下令启放高邮一带闸坝进行减泄,但因形势依然严峻,又下令将昭关坝启放。无论如何,琦善都须谨慎地对待道光帝的谕命。据其所奏,该年洪泽湖因来水过旺、降雨过多而水位极高,“不得不启放昭关坝”,“并非该参将张兆敢于自作主张”,“万一拘泥奏案,坚持不放”,恐怕会重蹈覆辙,造成更为严重的水患<sup>⑦</sup>。对此道光帝批复“知道了”,未再追问。这一事例表明,闸坝减水工程的运转明显失灵,区域社会深受其

①《嘉庆朝上谕档》第5册,第110页。

②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孙玉庭折,档号:04-01-01-0601-058。

③《清宣宗实录》卷6,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戊子。

④道光六年七月十三日两江总督琦善折,录副奏折,档号:03-9929-005。

⑤道光六年九月十五日江苏巡抚陶澍折,录副奏折,档号:03-9925-047。

⑥道光《泰州志》卷4《河渠志》,第20页b。

⑦道光六年八月初九日两江总督琦善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681-010。



害,颇为关注河漕大政的文人包世臣甚至诘问“文襄其得辞作俑之咎耶?”<sup>①</sup>不过据考察,苏北平原地区的圩田体系和垛田体系,跟黄淮运治理和地方水利开发的互动密切相关,尤其是清中后期,因泄水增多而得到进一步发展<sup>②</sup>。

总之,乾隆以降闸坝减水工程的负效应凸显。徐州附近河道淤积,黄河下游河患加剧,洪泽湖水位抬升,治河困难恪守“旧制”,运河被淹漕运受阻,农田水利系统紊乱,下河百姓频繁地与官府冲突,等等,均为重要表现。不过,几年后发生的震惊朝野的陈端盗决黄河大堤案,更集中展现了其所联动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交互作用,以及国家河工大政与区域社会发展的矛盾关系。

### 三、道光十二年陈端盗掘案始末及其驱动因素

#### (一)大堤盗决危及清廷的治河大局

道光十二年(1832)秋汛期间,黄河下游水势险急,且为“近数年”所未有,江苏段南北两岸甚至出现“普律漫滩”<sup>③</sup>。及至八月二十一日,桃南厅龙窝汛十三堡发生决口。起初口门宽仅四五十丈,但因河床已严重淤垫抬高,喷涌而出的黄水随即形成建瓴之势,迅速将口门刷宽,直至宽达一百九十余丈,致成“全黄大溜入洪泽湖”的局面<sup>④</sup>。毫无疑问,含沙量巨大的黄水流入洪泽湖极有可能致其严重淤垫,并引发连锁反应,影响清廷精心维护的治河大局。

览闭奏报,道光帝极为震惊:

全黄入湖,为从来未有之事……将来堵口复故,恐全湖俱成平陆,湖内又无浚法,并恐宝应、高邮以下运河兼受其害,于治河全局诚可为虑……本年回空军船是否不至阻滞,明岁新漕尤关紧要,断断不可稍迟。<sup>⑤</sup>

从洪泽湖淤垫到运河受害,再到漕运阻滞、治河全局可能遭受重创,清帝可谓忧心忡忡。然而“幸运”的是,决口发生前三天,上游的河南祥符下汛处河堤发生塌陷,致成口门六十丈,这样一来,龙窝汛决口虽然掣动大溜入洪泽湖,但水势“甚为平缓”,“沙淤不出三四十里滩地之内”<sup>⑥</sup>,道光帝所担忧的洪泽湖严重淤垫并可能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并未发生。比如漕粮运输,据河督张井奏报,该年漕船回空已七百余只,“即来年重运,亦决不致阻滞”<sup>⑦</sup>。钦差大臣穆彰阿亦奏及,截至闰九月初五日,漕船“已渡黄者计一千三百余只”<sup>⑧</sup>。不过,尽管形势并未糟糕至极,但仍须抓紧兴举口门抢堵工程。何况河南祥符口门堵筑之后,龙窝汛的水势势必大增,这样一来,“运河即不免淤垫,于漕运大有关系”<sup>⑨</sup>。

为尽快堵筑口门,清廷足额拨付工程所需经费,但由于“本年黄运湖迭次异涨,各厅险工百出,抢护不遑,各工均无存料”<sup>⑩</sup>,加以遭遇雨雪天气,堵口工程一再耽延。对此道光帝谕命“即再有雨雪,亦必于春水未生以前,克期蒇事,毋致迟误”<sup>⑪</sup>。翌年正月,口门堵筑,但费帑费物,工程进行得也比较艰难。

① 包世臣:《书乔徵君纪事文稿后》,刘平、郑大华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包世臣卷》,第165页。

② 王建革、袁慧:《清代中后期黄、淮、运、湖的水环境与苏北水利体系》,《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③ 《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南河成案续编》,第553、560页。

④ 《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462页。

⑤ 《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493页。

⑥ 《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478、525页。

⑦ 《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525页。

⑧ 《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533页。

⑨ 《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478页。

⑩ 《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南河成案续编》,第565页。

⑪ 《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643页。

无论如何,龙窝汛决口可谓于“全河大局无碍”<sup>①</sup>,道光帝颇感欣慰之际,发给张井十炷大藏香,命其高规格地祀谢河神。即便如此,事情远未结束,因为此次决口“全系人力刨挖(挖)”<sup>②</sup>,已然触动统治阶级的敏感神经。案发之初,张井倍感震惊,连上两道奏折:

有湖内民人乘架多船,携带鸟枪器械,人数众多,至十三堡上下,拦截行人,硬将大堤刨挖。兵夫向前喝禁,即以枪刀恐吓,并将巡兵田赋等捆缚堤旁,效用系从堤根小路潜行而来,报请救护。

此次失事之由,不特事理所绝无,实亦梦想所不到……是否陈端、陈堂、赵步堂三人即系首犯,图放淤肥地,抑或另有为首之人,别图不法情事,均未可定。<sup>③</sup>

不难看出,河督认为百姓盗决黄河大堤的目的并非放淤肥田那般简单,极有可能“别图不法情事”。御史冯赞勋则奏:

其潜蓄奸谋,已非一日。今即远扬,恐党类仍未解散,饶侦知文武官兵专意龙窝,难保不乘机窃发,另起奸谋。<sup>④</sup>

览毕奏陈,道光帝以非常肯定的语气谕示,“自必另有为首之人,别图不法情事,均应彻底根究”<sup>⑤</sup>,并以此案“系地方废弛之故”,将两江总督陶澍与江苏巡抚林则徐“交部议处”<sup>⑥</sup>。在这同时,按照河工律例,给张井等在河官员不同程度的处罚。由此,决口给君臣造成的恐慌与影响可见一斑。

为迅速缉捕案犯,道光帝派朝廷重臣穆彰阿前往查办,同时命林则徐在陶澍折返辖区之前担负办案之责。该年闰九月,林则徐两次奏报案件的进展情况,大致为:已将赵步堂、刘开成、海金周及其子海东楼抓获,“并获到供出之犯证十余名”<sup>⑦</sup>;续又“究出张开太、梁锦柱、金三即金陶方”等,“并此外到案人证一共三十余名”,不过要犯陈端、陈堂、陈光南仍然在逃<sup>⑧</sup>。不难想见,追拿要犯成为下一步办案的重心。起初,陈端、陈堂被指逃往安徽盱眙县一带,可陈堂在江苏泗州被捕后,陈端又被指藏匿于山东东昌府,当陶澍命人前往缉捕时,又被指逃往了东平州。若此,陈端续又被指逃向濮州、台儿庄以及河北保定等处。要犯久捕未获,道光帝大为震怒,遂命直隶、江苏、安徽、山东、江西各督抚以及漕运总督,“严飭所属”“不动声色,严密查拏”<sup>⑨</sup>。然而即便数省联合办案,也迟迟未能将陈端抓捕。

翌年六七月份,山东发生数起百姓盗决河堤的事件,道光帝认为原因主要在于“陈端未能立即枭示河干”<sup>⑩</sup>。不难想见,清廷的缉捕力度进一步加大。该年十月,终于在安徽省怀宁县将陈端抓获。怀宁县知县赵仁基因此而获得道光帝嘉奖,并打破职场瓶颈迅速升迁<sup>⑪</sup>。这亦展现了该案的影响之大以及清廷的抓捕之难。

①《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540页。

②《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462页。

③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南河总督张井奏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739-051。道光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南河总督张井折,录副奏折,档号:03-3531-042。

④《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467页。

⑤《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458页。

⑥《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572页。

⑦《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519页。

⑧《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540页。

⑨《清宣宗实录》卷231,道光十三年二月癸丑。

⑩《清宣宗实录》卷241,道光十三年七月丁酉。

⑪道光六年即案发前七年,赵仁基年近四十才“以进士官知县”,而自捕获首犯陈端,得到道光帝嘉奖,官运亨通,人生开挂。先是“以直隶州升用”,翌年又“补滁州知州”,仅数月“即升平阳府知府”,又仅数月“升江西南赣兵备道”;几年后升湖北按察使。曾国藩撰:《曾文正公诗文集》文集卷2《湖北按察使赵君神道碑》,同治本,第62页。

## (二) 清廷对案件的考量及审判

《清会典事例》刑部部分设有“盗决河防”一节,其中专门就盗决黄运大堤制定有处罚条例:

如但经故盗决,尚未过水者,首犯先于工次枷号一月,发边远充军。其已经过水,尚未浸损漂没他人田庐财物者,首犯枷号两月,发极边烟瘴充军。既经过水,又复浸损漂没他人田庐财物者,首犯枷号三月,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因而杀伤人者,照故杀伤问拟。从犯均先于工次枷号一月,各减首犯罪一等。<sup>①</sup>

由此审视陈端盗决案。该案不仅致成“全黄入湖”危及清廷的治河大局,令君臣倍感惶恐,而且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害与影响。案发后,黄水“倒灌凤泗,凤泗受其累”<sup>②</sup>。晚清黄河改道北行后,有人建言导淮入海,但又认为办理难度较大,原因之一即“奸民陈端决黄淤湖,北高南洼,清口以至高良涧几成平陆,黄河更有高仰之患”<sup>③</sup>。进言之,道光十二年陈端盗决黄河大堤引致的问题远超最重的处罚规定之限,相比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例亦严重得多。如此,清廷将面临着如何考量与审判的问题。

案发之初,君臣就怀疑案犯“别图不法情事”,并非只为放淤肥田,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推进,案情更显扑朔迷离,不仅更多百姓被指涉案,龙窝汛在河官员也成嫌疑对象。张井在奏报中谈到,龙窝汛千总沈得功“与陈端系儿女姻亲”,并且二人均有“湖地被水淹没”,“难保无知情故纵之事”,其他在河官员“多系本地,民人不应毫无闻见”<sup>④</sup>。若真如其所言,存有在河官员与沿河百姓勾结共同作案的情况,那么案件更为复杂,亦势必影响清廷的审判。

两个月后,穆彰阿、陶澍等人奏呈审理意见:首犯陈端“必应比照光棍例从重问拟,正法河干”,张开泰等二犯依盗决堤岸例,“枷号三个月,实发烟瘴充军”,陈明等十三犯“依决堤为从例加一等,拟以流二千里”。对此刑部认为“一事两引,核与定例不符”<sup>⑤</sup>,且有三个重要问题不甚清楚,即“奸民聚众挖堤是否意图淤地,该汛弁兵果否知情同谋,堡房兵夫曾否俱被捆绑”<sup>⑥</sup>。其中所及的“光棍例”,据研究,是清代刑事法律中量刑较重的一条,首犯斩立决,从犯绞监候;顺治十三年(1656)初定时主要为处罚对社会秩序造成相当程度冲击的光棍,后几经修订,至乾隆初定型;其时特别强调“情罪重大”与“特设严例”<sup>⑦</sup>。由此不难想见,初审拟将首犯“比照光棍例”而非“盗决河防例”判决,以及刑部将初审意见驳回,均有认为陈端聚众盗掘大堤严重扰乱基层社会秩序之意。

而后续新任钦差大臣朱士彦与陶澍的复审情况表明,沿河百姓聚众盗决黄河大堤的目的无他,主犯为放淤肥田,从犯则“贪微值糊口”,并且案发前,在河官兵“实不知情”,案件审理中所述的捆绑堡房兵丁等情亦“俱系捏饰”<sup>⑧</sup>。也就是说,此前君臣包括刑部驳回初审意见的种种疑虑基本可以打消。即便如此,最终判决并未减轻处罚,而是全依光棍例执行:首犯陈端未变,仍“照光棍例,拟斩立决,正法河干”;张开泰、陈堂改为“比照光棍为从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陈钦等十九人改为“于陈堂等绞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在这之外,清廷还以“玩视河防”罪处罚河官,情形较重者如龙窝汛千总沈得功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sup>⑨</sup>。由于首犯陈端迟迟未能抓捕归案,判决延迟至翌年十一月执行。至此,该案可谓尘

① 《清会典事例》卷854《刑部》132,中华书局影印本,第9册,1991年,第1272-1273页。

② 鲁一同:《安东岁灾记叙》,《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6《户政十八·荒政下》,光绪石印本。

③ 赵秉节:《导淮辨》,《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9《工政六·河防五》。

④ 道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南河总督张井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739-068。

⑤ 道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卢荫溥折,录副奏折,档号:03-3770-012。

⑥ 《复审奸民挖堤一案定拟折子(钦差会稿)》,《陶云汀先生奏疏》卷45《江督稿》,道光年刻本。

⑦ 苏亦工:《清律“光棍例”之由来及其立法瑕疵》,载苏亦工、谢晶等编:《旧律新论:〈大清律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0-326页。

⑧ 《清宣宗实录》卷228,道光十二年十二月戊辰。

⑨ 祝庆祺:《刑案汇览》卷60《盗决河防》,道光棠樾慎思堂刻本。



埃落定,但其影响仍在蔓延。

光绪十一年(1885),山东巡抚陈士杰在处理辖区类似问题时提到,“小民惟知切己之利害,辄思盗决,故禁令不得不严”,并拟以本案为据进行处罚<sup>①</sup>。光绪十九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亦在处理辖区百姓聚众盗决河堤问题时,将其视为“成案”加以援用<sup>②</sup>。毫无疑问,这从侧面体现了该案的影响之大与判决之严。其实,清廷之所以比照光棍例而非河防盗决例从严处罚首从各犯,除了前文所及,原因还在于拟籍此“彰国宪而儆凶顽”,沿河社会“益昭炯戒”<sup>③</sup>。毕竟案件调查到最后,君臣相信百姓盗决黄河大堤的目的无他,仅为放淤肥田。

### (三)案件产生的原因分析

案结后不久,工部侍郎程恩泽作了一首《河决》诗:

有人夜半决金堤,坐使黄流改旧溪;河伯已眠惊欲死,愚公此举太无稽。

谁能纠合千夫畝,只为膏腴六斗泥;坏我濯龙渊欲尽,长淮东注溢而西。<sup>④</sup>

从中明显可以感知,当朝大员对百姓盗决黄河大堤“只为膏腴六斗泥”的惊诧、不解甚至蔑视。而考诸黄河流域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沿河百姓早就对此存有较强的欲求,古谚所谓“一水一麦”“且溉且粪”,大概即指先民利用河水淤灌,改善土壤质量,提高农业生产。只是类似实践主要在黄河支流或者华北其他多沙河流附近进行<sup>⑤</sup>,黄河干流虽然泥沙含量较大,肥田效果更佳,但因“引河溉田”容易引致“河不通利”“其噎不泄”,自汉代就受到官方严格管控<sup>⑥</sup>。

本案中陈端等人的滨水田地如他们所愿,受淤后变得非常肥沃。穆彰阿在奏报中提到,“靠堤纵横二三十里,多已受淤,系在桃源县南岸二十图之内”<sup>⑦</sup>。林则徐奉命办案时亦察知,大堤盗决后,“地亩受淤之处现已成为膏腴”<sup>⑧</sup>。只是随着陈端等人被捕,这片受淤之地被官方“查明段落,照例入官”<sup>⑨</sup>。其实,君臣本就对黄水泥沙可以肥田的现象非常了解。乾隆四十三年,河南兰仪段发生大规模决口,清帝在部署抢堵工程的同时,命相关官员及时疏通黄水流路。在其看来,黄水从口门流出后若无阻碍,则“水过沙存,小民转得资一水一麦之利”<sup>⑩</sup>。受命督办该项工程的两江总督高晋覆奏时则谈到,口门以下三百里内,泥沙停淤,平地“悉成沃壤,不惟可以种麦,即秋粮亦可种植”<sup>⑪</sup>。不过相较过往,清中期更是严厉禁止沿河社会利用黄水资源,前文所及对陈端盗决案的审判即为明证。另考诸史实,自康熙帝将治河纳入政权合法性构建这一国家战略工程,并创置系统完善的管理制度予以保障,黄河两岸除了驻有品级较高的河督与为数可观的河官民夫,还设有大量河兵常年驻守<sup>⑫</sup>。由此,该案不能不令人疑惑,陈端等人长期生活在黄河岸边,当对朝廷高度重视黄河治理的情况非常了解,他们何以冒险盗决黄河大堤?

首先的原因当为生计所迫。从前文已知,此前数年由于清黄水网络运转不畅,洪泽湖存水过大,周边地区大面积被淹,百姓深受其害。本案发生的桃南厅龙窝汛十三堡于家湾,林则徐办案时曾到附近查

① 陈士杰:《遵旨筹办河防据实直陈疏》,《清经世文续编》卷90《工政三》。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77《严禁聚众掘堤折》,民国景金陵原刊本。

③ 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两江总督陶澍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750-024。

④ 程恩泽撰:《程侍郎遗集》卷3《河决》,粤雅堂丛书本。

⑤ 姚汉源:《黄河水利史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年,第450-468页。

⑥ 酈道元:《水经注》卷1,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⑦ 《道光朝上谕档》第12册,第541页。

⑧ 《遵旨将挖堤案犯陶澍等审办折》,《林则徐集》第1册《奏折》,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

⑨ 《复审奸民挖堤一案定拟折子(钦差会稿)》,《陶云汀先生奏疏》卷45《江督稿》,道光年刻本。

⑩ 《乾隆朝上谕档》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1页。

⑪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5辑,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337页。

⑫ 贾国静:《“治河即所以保漕”?清代黄河治理的政治意蕴探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

看,访谈“年老兵民”得知,以前湖滩田地收成尚可,“近年湖渚较旺,十一十二两年盛涨均至二丈一尺以上,为向来所无,滩上田地遂成巨浸”<sup>①</sup>。案发前一年,南河总督张井甚至感叹“自桃汛以来,水势长落及风雨阴晴,事事出人意料之外”<sup>②</sup>。由此可见,陈端等人在洪泽湖附近的土地连年遭受洪水淹没。而这一状况不仅意味着生计困难,而且极易造成地力下降,产生长期影响。不过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他们盗决黄河大堤以图放淤肥田的唯一原因。

其次,陈端等人长年生活在黄河岸边,对黄河的修守状况有一定了解,并由此存有侥幸心理。案件审理过程中,众人交代他们起初非常担心盗决大堤会招致祸端,而陈端称其与河官沈得功系儿女亲家,“可以商谋”,至于其他人,因“皆系沈得功所管”,“将来开放后,不过禀报漫溢,可保无事”<sup>③</sup>。由于基层河官员弁多出自沿河地方,陈端与之熟识并耳闻河工弊病乃情理之事,故其一番说辞打消了众人的顾虑。另据研究,将决口“禀报漫溢”,推脱罪责,的确是清中期河工腐败的重要面相之一<sup>④</sup>。只是众人始料未及的是,秋汛水大之时盗决已成地上“悬河”的黄河大堤,极易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透过对陈端盗掘案的深入分析可见,由于清中期清黄水网络运转失常,洪泽湖水环境持续恶化,不止东面的下河地区经常遭遇泄水的祸害,西面的区域亦深受水患的困扰,加以该时期河务这一场域贪冒腐败问题非常严重,百姓迫于生计最终采取了盗决黄河大堤这一在朝廷看来不可思议的极端行为。不过这也表明,清中期在清黄水网络所覆盖的广大区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极为紧张。

## 余 论

古代水利主要包括防洪治河、农田水利和航运工程。就清代黄河下游而论,防洪治河乃重中之重,但同时,清廷通过闸坝减水工程构造了一个巨大的清黄水网络,从而将防洪、灌溉、水运密切关联在一起。这一水环境格局与水资源利用方式颇为独特,或可称为防洪型水利网络,只是区域社会发展所受影响在不同时段存有差别。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防洪保漕乃国家大政,关系政权安危,另一方面则因为黄河自身的水沙特性所在,在前近代农业文明之下,难以质性突破其可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的资源瓶颈。或者说,黄河下游的环境特质与治河技术条件的限制使其具有巨大的张力。民国时期,水利发展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西方科学技术亦深度介入,黄河下游才最终实现了直接的引黄灌溉。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黄河下游水利的开发利用进入大发展时期,农田灌溉、工业用水、水力发电等受到高度重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总之,清代精心构造的防洪型水利网络既为祛除水害,也为兼资其利,这种防洪、灌溉、水运一体存在的形式,区别于黄河上中游,亦不同其他江河流域。厘析这一问题有助于从环境与技术的角度,拓展并深入认识清代黄河下游的国家防洪工程与沿河区域社会的发展,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历史时期黄河水患与水利的矛盾关系。通过古今互视的视角审视,则可借助现代水利科技带来的突破性发展,对前近代社会的河患问题以及古人的治理实践多一重理解。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遵旨将挖堤案犯陶澍等审办折》,《林则徐集》第1册《奏折》,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

② 道光十一年七月初三日南河总督张井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728-046。

③ 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两江总督陶澍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750-024。

④ 参见贾国静:《河堤上的腐败:乾嘉年间河务“全员贪污”》,《中国人大》2016年第21期。